

游动悬崖

王家新

二十世纪末中国诗人自选集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PDG

游动悬崖

王家新

游动悬崖

王家新

PDG

〔湘〕新登字 002 号

我没有什么资格 / 我特别喜欢卖弄 / 我缺乏必要能力
我从小盲目冲动 / 可我还是能等 / 可我还是能忍
你不让我摇摆 / 迟早让你知道我的眼!

游动悬崖

王家新 著

责任编辑：曾玉立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：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*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8.875 插页：1

字数：196,000 印数：1—4,000

简易精装：ISBN7-5404-1732-3
I·1386 定价：11.00元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
(厂址：长沙市韶山路 158 号 邮编：410004)



王家新

日记

以一棵尖尖的橡树开始

园丁推着他的锄草机，从一个圈
到另一个更大的来回，

整天我听着这声音，我嗅着
青草被刈去时的新鲜气味，
我呼吸着它，我进入

另一个想象中的花园，那里
青草正包裹着白色的大理石卧雕，
青草拂动，这死亡的爱抚
胜于人类的牙指。

醒来，锄草机和花园一起荒废

万物服从于更冰冷的意志；

橡子炸裂之后

园丁得到了休息；接着是雪

从我的写作中开始的雪；

· 作者手迹 ·

游动悬崖·自序

“如果不是我……”

谈论自己总是困难的，尤其是谈论自己的诗。似乎转瞬间，我们已在写作中走过了一、二十年的历程。在这期间，诗人们有的远走他乡，有的永远离开了我们；有的弃文经商，成为让人眼羡的暴发户；也有人在贫困中坚持写诗，而且愈写愈好。我就处在这样的一代人或两代人之间。我不想说我的诗就是这个时代的“见证”，但在编校这部诗集时我却一再感到：无论我们多么渴望个人在历史中的自由，我们的写作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当代政治文化生活的影响；也无论我们已走到多么远，我们最终仍要回到这种我们注定要承受的“汉语的现实”中来。写到这里，我就想到几年前我在北京圆明园附近的一幅照片。拍照者是我的比利时朋友伊歌。等她回国后把照片寄过来，我不免吃了一惊：照片上的这人是谁？在这北方的秋天，额头几乎被一种致命的光所镀亮——我真不知那一刻他在侧身凝想什么！也许，在那一刻对历史或个人的任何回望都是痛苦的，甚至是迷惘的；但我想如果不是他，如切斯瓦夫·米沃什的诗所说，“会有另一个人来到这里”，并且

用一种也许是更好的方式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。

游动悬崖或其它

诗集取用这个名字，看来有必要向读者作出某种交待。“游动悬崖”，荷马典故；它指的是由于女神的提醒，奥德修斯在返乡途中避开的一条危途，在那里“岩前喧腾着青眼的安菲特丽提的巨浪，就连有翼的鸟也飞不过去……只有一艘海船曾从那里走脱”。这样，“游动悬崖”在荷马史诗中也就成为“一条未走的路”，它仅仅提示了一种命运的可能性。

问题是“一条未走的路”，如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一首同名诗所暗示的那样，总是比我们已走过的更令人感叹。实际上它并没有“远离”我们，而是以一种为我们不曾意识到的方式参与着我们的当下存在。正因为它是“游动”的，这就使你既不知它何时“前来找你”，但也不可能绕开它。你只能让这种若隐若现的存在伴随一生，直到发现“游动悬崖”在你之外同时又在你自身之内，发现正是这一切造就了你的命运。

这就使我想起了十多年前我游历新疆时一个人为我算的一卦，它仅有一个字：驿。我在当时心里一震，因为它正好印证了我的实际生活和我对自己“命运”的某种直觉。驿，驿站，总是在路上。总是奔波、滞留，无助而又无望；总是来到终点发现它不过是个起点；总是在词中上路，又总是永无归宿；总是在本土与异乡之间，在个人与时代之间，甚至在生与死之间来回移动；总是在升起的诗歌陡坡前停下；总是……读者不难发现，正是这一切造就了我个人的“天路历程”，形成了我诗歌中的这样或那样的风景。或可说，无论我写下的诗歌好坏，它都不是灵机一动的产物，而是和我的这种经历相

关联的。

而我最后定下用荷马史诗中的“游动悬崖”作为集名，是因为我相信它同“驿”一样，已构成了我们的“基本词汇”之一。无须忌讳，我们这一代人正是在整个人类的文化传统下长大的，虽然我们的写作又总是一种关于中国、关于我们自身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。换言之，“游动悬崖”一再来到我们中间，是因为它已成为我们现实的一部分。

某些历史时刻

编校自己的诗集，不免伴之于某种历史反省。一句在八十年代颇为响亮的话是“诗人不是作为某个历史时刻的人而存在着，他是上帝或神的使者”。而我不幸正相反。我只是感到自己在历史中才存在着，才获得自己的感知、痛苦以及“更高认可”的冲动。（当然，历史不应仅被理解为“大事件”；当你挤上北京的公共汽车，或是到托儿所接孩子时，你就是在历史之中。）写到这里，我仿佛又回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北京西单居住的那些日子。我不能不感到那时在我们内心里经历的一切，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期，而对一生的写作都有了意义。我想正是在“历史”的压力下，“更深的基础已经奠定”（莫非），我不得不考虑怎样以个人的方式去“承担”的问题。但正是在这里，我似乎犯了忌。1992年6月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期间，当我和一些海外的中国诗人谈到帕斯捷尔纳克，有人不屑地讲“他是个政治诗人”；谈到索尔仁尼琴，一位我素来尊敬的“朦胧诗”代表诗人的反应是：“他很反动”。这我就更不懂了。我深感震惊，同时还有一种深深的孤寂。当然，这不仅促使我反省自己，也加强了某种“独自去成

为”的信念。诗歌的“纯粹”与“自足”依然是个高尚的目标,但我要做的,首先是按自己内心的要求去写作。正是在那个异国的冬天,我写出了《临海的房子》、《词语》、《卡夫卡》、《日记》等作品。我要求在我的诗中能够出现一种广阔的视野,同时又带有一种我个人的、或者说这一代人的那些最噬心的伤疼……换言之,我在考虑一种能与历史的要求相称的个人诗学。当然,这一切决非那么简单,我只能尽力而为。

青春或后期

在历史中,有些诗人向我们贡献的是青春,像兰波、海子,起点差不多就是顶点,一闪而逝的、高代价的黄金。但更多的人向我们贡献的是更为成熟的成年和晚年:叶芝、杜甫、里尔克。所谓“精神英才的伟大劳役”就体现在这样的“后期”里,只不过对大多数读者它很可能又是极其艰涩的,“早年的优美哪里去了?”

而一个诗人经历得太多、或太艰巨了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哑巴(参见《另一种风景》中的《哑语》)。这恰恰又是他的拯救。这使他“有资格”对我们讲一些我们还不太懂的话。

言归正题:我们倾心于一个叶芝或里尔克式的“后期”,但我们之中有谁敢于这样预期自己?我只是深为自己的青春羞愧。当我回顾人生,我总是越过那个时期而直接与一个“无辜的孩子”相会。而青春写作,先天不足同时又过于受到那个时代氛围的支配:它开出的大多是一些谎花。

因此,编校这部诗集时,我鲜有“收获的喜悦”,倒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欠债之感。这种愧疚,正如米沃什已确切地表达过的那样:我们被许诺给一个伟大、伟大的生活,可是我们

尚未诞生。

也许，正是这种欠债之感——对自己与对同时代人的，促使帕斯捷尔纳克写出了他一生的艺术总结《日瓦戈医生》。对此，西穆斯·希内在《雨声》一诗中有着深切的描述。看来在“欠债”这一点上，真正的诗人与诗人总是相通的。因此那抽打着帕斯捷尔纳克良知的雨声为希内落了下来，并使他在这种彻夜的抽打中辗转难眠，直到“浸泡、浸泡在运气里……”

那么我们自己呢？一片热烈的、充满了聒噪和尘埃的金色手工艺的土地。

“当你归来你将成为陌生人”

“当你归来你将成为陌生人”，1994年初，当我旅欧两年回国，正好印证了这一古老的箴言。这对我自然需要一个不无痛苦的适应过程。但，时代巨大的动荡，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自身命运的认知（例如那一年写下的《饥饿的艺术家》），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。要求之一，我想即是由单纯的“写诗”转向“写作”；即使写一首诗，也要求它能达成一种对存在的“敞开”，能包容着比过去更为丰富的东西。总之，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，“仿佛一个音乐家永无休止地演奏一件乐器，但却仅用他的小拇指来演奏”（卡内蒂）。

我想正是在这种写作实践中，诗歌开始恢复“对文学讲话”的能力，或者说一个不同于八十年代的诗学时代正在形成。人们包括我自己曾从种种不同角度来认识或限定这样一个时代，但无论怎样描述或对话，最后都几乎成为一种讽刺。阿赫玛托娃在她那个艰难的时代，写但丁的流亡，写一种“伟大人物的受辱”；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是一个多么让诗人们

神往的时代！而在今天呢，我们置身其中的，却是一个“爱你没商量”而又让你哭笑不得的时代，一个如此不读或误读的时代……

这使我一再感到个人在历史中的无力，或者说，一种荒谬感的加剧。这也促使我愈来愈了解到我们这些人写作的性质。诗人西渡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谈到一些中国当代诗人，然后说“比较一下王家新吧，他是最强烈地渴望承担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的诗人，他的想象的读者对象却是个别的、私人性质的”。我不敢说他对其他诗人的判断是否确切，但却惊异于他在谈论我时的某种敏感。的确，他看到了众多的评论者不曾洞察到的东西，那就是在我们的写作中所包含的“个人写作”性质。正是这种性质使我从不要求自己的诗“对时代讲话”。1992年我在比利时写下了一首《日记》，其实我是从不记日记的（除了小时候在老师或父亲的要求下）；我索性这样命名，无非正因为这首诗本身的“个人性质”。我想正是这种性质使我们即使在谈论时代时也是在对“个别人”讲话。同样，西川看上去是那种“向人群发言的诗人”，其实不是，那么他在对谁讲话？

维特根斯坦在他的本来不愿发表的《哲学研究》序言中这样说到：“本书的本意是要在这贫困而黑暗的年代，为几个智慧的人带来光明。——而这，当然，不可能做到”。我深深理解维特根斯坦说这句话时的心情（因为我多少了解他写作的性质），虽然我们自己还远远没有资格这样讲话。

另外我想说的是，虽然在这个时代写诗不能不是一种个人的行为，但诗人们在这几年提出“个人写作”，却并非出自无奈，而是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对自身写作的一种自觉限

定。通过这种限定,我们的写作与时代重新建立了一种联系,也意在与这样那样的意识形态话语区别开来。当然我也知道,像“个人写作”这类提法是最会受到曲解与误读的。然而事实上却是:个人不是封闭的,那种抽象的个人也不存在;个人总是在历史中;因而个人写作又总是一种对历史的承担,甚至是一种对人类无穷生活的敞开。因而帕斯捷尔纳克会这样来倾听一个内省的肖邦:

“所以在静谧、安宁的F大调夜曲的中段,深夜暴风雨骤起之时,庄园的窗户意外地敞开了。”

“从前有一个少年……”

要在一大堆人面前谈论自己是困难的——虽然诗集尚未出版,读者却已经出现了,而且写着写着我居然产生了一种向组织上“写检查”的感觉!看来最好不去谈“我”。诗人布罗茨基在移居西方后写下的自传性随笔《小于一》中,以“我”开始;到最后却变成了“从前有一个少年”这样的叙述。而我仿佛从中受到重大指点。的确,正是这种“从死亡的方向向回看”,这种唯有在一种历史性的视野中才出现的人称转换,使得我们“谈论自己”有了一种可能。

那么,校对诗集,无疑给了我一个把这十多年走过的历程再向回看一遍的机会。在那里我似乎遇到了多个自己,或不同诗歌境遇中的自己,这使我感慨万端。但同时我又感到:我们似乎只有在这种写作的分裂和反差中才是完整的,或真实的。谁让我们“有幸”经历了这样一个复杂动荡的时代呢。评论家程光炜十分敏感于近年来我在写作上的变化,在一篇文章中说,“王家新在埋葬自己留给诗坛的形象。”光炜这样

讲自有他的角度；但从另外的角度看，其实我们是无法埋葬自己的过去的（虽然这何尝不是我自己的希望！），因为它仍在我们自身之内。离开了自己的过去，我们的现在就是不可想象的。因此我想，我们能做的，或许不是急于埋葬自己的过去，而是怎样让它出现在一种新的视野里。

“我于1936年开始再次写作，但我的笔迹变了，而我的声音听起来也不同了”（阿赫玛托娃《日记散页》）。简洁的陈述，却有一种让人惊心动魄的东西；好像是时间在通过历尽沧桑的诗人讲话，或神明。的确，诗人没有变，但时间却通过她开口说出了连她自己也感到惊讶的东西。

王家新

1997.6.18 北京

自 序	1
-----------	---

辑一 触 摸 (1985—1988)

风 景	3
空 谷	4
醒 悟	5
倾听音乐的一种方式	6
在一条街的尽头想起梵高	7
秋 天	8
触 摸	9
访	10
山上与山下	12
预 感	14
加里·斯奈德	16
五台山遇雨	18
蝎 子	20
刀 子	21
练习曲	22

赞 美	24
什么地方	26
再也不会有人来了	27
诗 歌	29

辑二 瓦雷金诺叙事曲 (1989—1991)

北方札记	33
守 望	36
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	38
瓦雷金诺叙事曲	40
楼 梯	44
光 明	45
铁	46
火车站	47
词 语	48
转 变	50
最后的营地	52
埃兹拉·庞德	54
持续的到达 (组诗)	57
帕斯捷尔纳克	64
反 向 (诗片断系列)	67

辑三 游动悬崖 (1992—1995)

词 语 (诗片断系列)	77
斯卡堡	92
诗	94

叶 芝	97
临海的房子 (诗片断系列)	99
欧罗巴的秋天	104
布拉格	106
日 记	108
卡夫卡	110
醒 来	112
另一种风景 (诗片断系列)	114
边 界	127
游动悬崖 (诗片断系列)	129
纪 念	143
致一位尊敬的汉学家	148
乌 鸦	150
蒙霜十二月 (诗片断系列)	155

辑四 挽 歌 (1996)

布罗茨基之死	161
尤金, 雪	162
坐火车穿过美国	163
致一位女诗人	165
挽 歌	166
无 题	170
伦敦随笔	171
十一月的冰	178
旅行者	180
挽 歌	182

诗学文章

回答四十个问题	187
谁在我们中间	215
饥饿艺术家	223
读叶芝日记	232
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	236
奥尔弗斯仍在歌唱	239
阐释之外	
——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	249
王家新创作活动年表	265